

【论 文】

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¹

王海兵²

摘要：本文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康建省运动置于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康区民众的省制观、国民党中央指导下的康区精英省制运动、刘文辉的省制策略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些不同层面的力量在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博弈。

关键词：西康建省；康区民众；国民政府；格桑泽仁；刘文辉

西康建省是近代中国行政建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曾深刻影响过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近几年，随着康藏研究的逐渐升温，西康建省再度为人们所关注。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看，往往是侧重于探讨西康建省的意义，而对建省的过程尤其省制化过程的分析失之简单。本文试图将1927-1939年间的西康建省运动置于各种势力的角逐中进行考察，揭示不同层面的力量在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博弈。

一、康区民众对建省的态度

西康建省之议起于清末国步益艰、藏事日亟的情势之下，并随着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强力经营而臻于成熟。宣统三年（1911）三月，在相继完成对康区大部分地区改土归流的基础上，赵尔丰以回应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广总督岑春煊统筹西北全局的形式，明确以川边建省为主题上奏朝廷。³紧接着，赵尔丰的继任者傅嵩林再次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向清廷详细阐述了川边建省的理由，并奏请设立“西康省”。⁴但是，当该奏折上递时，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川省秩序已经大乱，文报不通，不久清朝即宣告垮台，于是傅嵩林的西康建省折也空为后人留下一纸蓝图。

进入民国以后，康区历经尹昌衡、张煦、刘锐恒、殷承、陈遐龄及刘成勋几位统治，一贯兵威，既不足以震慑，政绩又多亏败不堪，均以争夺攘据康东打箭炉为能事，坐收税金，以求发展势力于川南，致使川边政府在康区大失民心。而自1918年康、藏冲突后，康区二十余县被藏军占领，在西康的藏军控制区内，残酷的剥削使得康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康藏划界仍成悬案，康区局势时常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西康建省之议遂湮灭无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西康省制化议题再次被国人提起。1928年9月，考虑到蒙藏地区幅员辽阔，袤延万里，蒙藏边防的虚实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因此为了安定蒙藏地区及其周边的政治形势，国民政府明令将兼管蒙藏之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宁夏各区，改建省制。而就西康的实际情形来看，当时的西康（仅限于国民政府政令所及的康东十三县地区）地方“既无得力的政治负责之机关，又无得力防守之军队”，至于被藏兵占领之地，则苛虐蹂躏，而未失之十余县则匪盗横行、哀鸿遍野，致使康人“既不能与川民受同等之待遇，复不能与藏民享共同之利益”。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无论是旅外西康人士还是身处康区的广大康民都表现出了对康

¹ 原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² 作者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³ 参见《议复岑春煊等统筹西北全局奏请川边建省折》，宣统三年三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0-921页。

⁴ 参见《傅嵩林请建西康行省折》，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032-1035页。

⁵ 《西康国民协进会及旅京民众等请防止英帝国主义嗾使藏军进攻西康要求成立西康省政府等呈文》，1929



区状况的不满与担忧。于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通过建省来保护本地区的利益渐成康区民众的呼声。

1929年8月17日，西康旅京人士刘家驹、格松尼马等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西康警报频来，危亡已在眉睫，恳请迅派负责人员组织西康省府，以图挽救。”言之所及，掬诚泣恳，闻之令人动容。当时处于极度混乱环境下的康区民众由于饱尝战乱的痛楚，在省籍意识上，除了要求直隶中央外，也明显体现出了对西康政治的参与感。在1929年西康国民协进会的呈文中，虽然认为解决康事之“先决问题”为组织西康省政府，但是在西康防卫问题上主张将西康军队“彻底改编，另组为西康省防军，完全脱离川局影响，俾得专门从事康务”；认为防守康区的军队“若仍归于川中将领之指挥，则遥遥节制，呼应不灵，终陷过去因循敷衍之覆辙”；对于西康省政府的人员组成，则要求“于西康省政府人选中，参加过半数康人，俾于扶植弱小民族之意中寓康人自理政权之真义”。¹而作为康区精英，格桑泽仁也曾于1929年3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西康建省的人员安排计划，他认为“省政府委员至少亦须七人，其中西康应占四人，按康之东南西北四部各选一人，在此过渡期间，无论僧俗，需择其素有声誉、为人民信仰者，如此，则康之部落易于团结”。²这也同样体现了康民在西康建省问题上的自治理念。

1930年，因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的土地差民争端的持续升级而形成了康、藏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促使国人尤其是康区民众更加担忧英帝国主义的威胁，西康建省的呼声在康区防务危急的关头也因此进一步高涨。至1931年，纠纷渐成迁延不决之势，前线真相众说纷纭，康区防务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康民于同年2月11日组织了民团组织——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并提出了“家出一兵，誓与藏逆决一死战”³的豪言壮语。同时，西康旅京人士杨仲华、马泽昭等纷纷吁请中央从速组织西康省政府，以专责成。⁴西康旅京同乡请愿团更是分呈国民政府与刘文辉，明确提议以班禅为西康省主席。⁵而诺那驻成都代表熊禹治也于1931年4月在其《解决康藏问题建议书》中主张将西康分建康定、昌都两省，建议任命诺那为昌都省主席。其中，康定省西界为金沙江，昌都省西界为丹达山。熊禹治的这一主张被任乃强先生认为是“规划西康建省诸说之最有价值者”。⁶总的来说，上述要求西康建省的呼声反映了康民保家卫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同时也明显体现了康民参与康区管理的意识觉醒。但是在当时西康的客观条件下，必先将军事妥为筹定，然后庶政乃有次第设计之可能。

二、1932年格桑泽仁的建省实践

对于西康民众强烈要求建省的呼声，国民政府相当重视。1929年2月26日，国民政府决定派吴醒汉、魏崇元等为视察西康专员，赴康调查军政、教育、实业等，并会同四川省政府筹备西康建省事宜。⁷但是，时过半年尚未就道，致使康民因以失望。¹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第

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档案全宗（1）2618。

¹ 同前。

² 宁墨公：《西康防务论》，《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

³ 《西康特区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为请发兵或枪弹援救康民事致刘文辉电》，1931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⁴ 参见《西康旅京民众杨仲华等请中央速电达赖制止藏军侵康并拟四项处理办法致蒙藏委员会呈》，1931年3月23日，《康藏纠纷档案选编》，第92页；《中央执委会秘书处奉转西康民众代表吁恳制止达赖侵犯西康请愿书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1931年4月8日，附《抄西康民众驻京代表请愿书》，《康藏纠纷档案选编》，第105页。

⁵ 参见周儒海：《西康建省运动的检讨和展望》，《边事研究》1936年3卷3期。

⁶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页。

⁷ 参见《国民政府训令四川省政府派吴醒汉等筹备西康建省文》，1929年2月26日，张羽新、张双志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197次会议决议咨请国民政府，迅行规划组织西康省政府。² 然而从当时国民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实际影响力来看，西康建省的条件显然还没有成熟。以西康国民党党务为例，1926年，正当国民革命在全国兴起之时，三民主义的空气也开始弥漫到了僻处一隅的西康地区，其后虽经当时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禹九）的积极倡导与扶植，国民党党义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自从1928年刘文辉的24军接管西康后，西康国民党党务却相继被停办。³ 党务的发展从侧面上反映出当时国民党中央在康区的权力是相当薄弱的。这一情况决定了国民政府还不大可能对整个康藏问题做出具体有效的计划，加上当时川局未定，因此对康民西康省治的呼声，国民政府的回应只能示以理论上的指导，暂时未能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

然而1930年康藏交界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很快使这一困局发生了转机。1931年4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8次常务会议决定派西康籍的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随后蒋介石亦以康藏国防关系重要，为疏通康藏隔膜起见，又加委格桑泽仁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之职，并发给无线电收发报机一架，以方便联系。⁴ 很显然，国民政府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增进对西康的控制，为西康建省做准备。1931年7月，就在康案特派员唐柯三尚在康区调解康藏纠纷之时，格桑泽仁担负着国民党中央的旨意从南京出发，前往西康。⁵

1932年2月初，当格桑泽仁到达巴塘后，先于巴塘成立办公处，并印发了各种藏文宣传品，积极派员赴康南各处宣传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将国民党中央优待康藏民众的事实列举详告，并将康民中的优秀分子组织成立党义研究会。其他的人民团体，如喇嘛佛教联合会、妇女协会、商会等均次第成立。⁶ 格桑泽仁的党务活动对驻康24军的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抵制国民党势力，刘文辉令康区各地驻军监视党部行动，并检查邮政，继而由24军主办的康藏通讯社登载侮辱党部的消息，甚至对党部人员实施抓捕。驻康川军的行动激起了康南民众的愤慨，继而康南各地的24军驻军概被缴械。1932年3月，康南各县代表148人齐集巴塘，决定组成“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以纳噶活佛为主事，并将西康当局贻误国防、压迫康民以及残杀国民党党员等经过呈报国民党中央及通电全国，并声明不再服从24军当局。同时，请中央根据1928年发表的西康建省令，速派大员来康组建省政府；由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推选委员15人，组成“西康建省委员会”，以促成建省；组织“西康省防军司令部”，将各县原有民兵统一组织训练，当时编制之僧军与民军总数达7800多人。⁷

康南事态的发展可以说出乎国民党中央的预料，因此当格桑泽仁于事件发生后请求国民党中央派员主持康事时，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于1932年3月28日、5月13日电复格桑泽仁，令其取消委员长、司令名义，回京报告。⁸ 很显然，中央不愿看到因康南事件而造成与刘文辉的公开对抗，因为当时的格桑泽仁除了在名义上拥有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头衔外，在实际的军事资源上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实际控制康区。因此，国民政府直接接管康区的时机显然尚未成熟，而且也不愿看到因为康南事件而使康藏纠纷扩大。

¹ 参见宁墨公：《西康防务论》，《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西康国民协进会及旅京民众等请防止英帝国主义噶(唆)使藏军进攻西康要求成立西康省政府等呈文》，1929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档案全宗（1）2618。

² 参见《中央政治会第一百九十七次会议》，《蒙藏周报》1929年1卷3号。

³ 参见黄奋生：《蒙藏新志》，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5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⁴ 参见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1932年铅印本，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目录（综合类）全宗1-38/5，第13页。

⁵ 《如何应付康藏问题·党务人员出发》，《蒙藏周报》1931年第75期。

⁶ 参见佚名：《格桑泽仁代表入京之报告》，《四川月报》1932年1卷4期，第110页。

⁷ 参见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第18-21页。

⁸ 参见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第23页；《三月二十八日蒙藏委员会电》、《五月十三日中央执委会电》，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6-457页。



而对刘文辉来说，早在格桑泽仁在巴安起事前，刘文辉就以唐柯三与藏方所签条约于四川损失太大、不能接受为由，于1932年2月从国民政府手上取得了康藏纠纷事件的处理权，因此格桑泽仁在巴塘的活动无疑是在危急时刻挖刘文辉的墙脚，这对当时在康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刘文辉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尽管后来由于藏军对康南的进攻使得格桑泽仁基于国防上的考虑而搁置了与刘文辉的个人恩怨，双方暂时取得了一致，但是格桑泽仁的存在始终对刘文辉在康区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因此，当康南战事告一段落后，刘部迅即重新接管了康南，而格桑泽仁也即于1932年9月离开巴塘。随着格桑泽仁的撤离，由国民党中央所“导演”的康区精英省制运动也暂告一段落。

三、刘文辉的省制策略

1927年夏，刘文辉吞并刘成勋的部队进驻康区。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为四川省省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在刘文辉接手康区之初，康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纵观这段时期刘文辉对康区的施政，虽然在西康设立有“西康政务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隶属于刘文辉的24军军部边务处。在这段时期里，刘氏经营西康，“其目的并非在整顿边政，其最大目标，实欲藉经营边政之虚名，以售其扩张地盘增加收入充实军备之计，且西康幅员广大，而刘氏所汲汲经营者，事实上仅于川地之雅安宁远一带而已，平时除抽粮纳税以外，并不闻有何等殖边计划，见诸实行”。¹ 套用刘文辉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主持川政，故对康区“精神不克专注，一切建树未能俱如所期”。² 但是，此后形势的发展促使刘文辉必须在西康建省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

首先，自1932年以来，在川康军与青海军队的联合反击下，金沙江东岸四县被川康军收回，部分解决了西康省境的问题。而西藏方面也在这次战争中意识到了康、青军队不可轻视，加上西藏内部反战情绪的高涨，此后不敢大规模进行康藏战争，为西康建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更主要的是，1932年冬就在川康军把藏军驱赶至金沙江以西之时，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军反对刘文辉的四川内战发生。从1932年冬到1933年秋，在经过三个大的战役后，刘文辉被赶到了汉源场。最终还是看在“家族情谊”的面上，刘湘把雅安、荣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才由此在康雅一带立足。³ 刘的失败加速了西康建省的进程。

当时对已经退据边陲一隅的刘文辉来说，通过建省来确定地盘的“合法性”便显得十分迫切。而对国民政府来说，由于1932年9月的西防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和康、青、藏边界的防务问题，同时青、康军阀无视中央意见而擅签的康、青、藏边界条约也显示出了南京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尴尬境地。而且当时急于控制四川的蒋介石也不愿看到刘湘的势力坐大，因而也同意让刘文辉据持西康，以作为牵制刘湘的工具。⁴ 加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亡的意识空前高涨，当时国民政府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做了长远的考虑后认为，西南的川康地区是进行持久抗战的理想根据地，包括西康建省在内的川康地位问题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于是各方政治利益的演变结果是，1934年2月，南京政府颁发了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并于1935年7月在雅安正式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西康建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康政治从24军的军管时代进入了省政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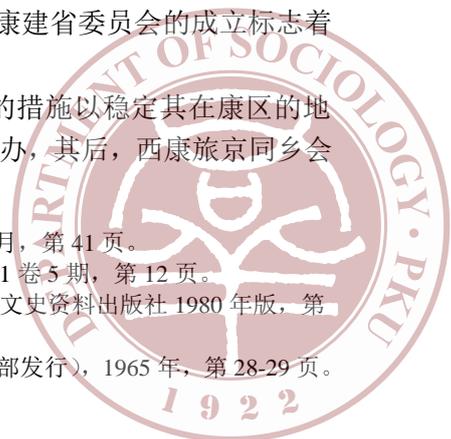
其次，国民党中央试图加强对康区的控制迫使刘文辉采取正确的措施以稳定其在康区的地位。格桑泽仁事件后，稍有起色的西康党务在刘文辉的压迫下再次停办，其后，西康旅京同乡会

¹ 王克训：《西康问题的检讨与今后之对策》，《蒙藏政治训练班季刊》1934年6月，第41页。

² 刘文辉：《完成西康建省之意义及今后施政之中心骨干》，《康导月刊》1939年1卷5期，第12页。

³ 参见陈光藻遗稿：《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大混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⁴ 参见张为炯：《西康建省及刘文辉的统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内部发行），1965年，第28-29页。



曾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西康党务有所建议，但是考虑到种种情况，执委会对西康旅京同乡会的请求做了缓办的批复。¹ 即便如此，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西康建省而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上有更大作为的努力却一直都未放弃，更没有放弃在康区排挤刘文辉以达到直接控制西康的目的。这一点在1935年的诺那事件以及1939年的班禅行辕事件中有明确体现。关于这两起事件，刘文辉在1939年12月25日的一份报告中认为：（1）发起者都是中央所组织的机关；（2）都是假借中央名义以煽动康民；（3）都是宣称只反对地方政府及驻军而表示服从中央。因此，在上述事件的定性上，中央不认其为变乱，社会亦忽视其为变乱，这使得刘文辉在康区的境况显得十分尴尬。对此，刘文辉曾含沙射影地表达了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² 同时，对于上述事件中频频出现的“康人治康”的口号，刘文辉认为“为了建设的成功，人才不应该限以省籍”，“以‘康人治康’相号召，其阴谋在割据造乱，苟得结果，也无非在摧毁西康，这完全与建设新西康的光明大道背道而驰”，³ 明确表达了对这种做法的批评。解放后，已经回到人民阵营中间的刘文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更是直白地认为这些事件“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利用和制造汉藏民族矛盾，来打击我，限制我，削弱我，使我无法立足，以达到其控制西康的企图”。⁴

由于自身所面临的窘迫境况以及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康区的明争暗斗，为了能在形势复杂的康区站稳脚跟，刘文辉针对康区特殊的社会状况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宗教上，进入民国以来，在康区复杂的民族政治形势和汉藏间关系紧张、冲突频繁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搞好了康区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因此，从尹昌衡到刘成勋的历届川边政府对于康区宗教均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恢复和保护川边寺庙就成了当时川边政府对藏政策的重要一环。同时，为了指导边、藏僧俗修明佛教，以谋五族共和，加强对喇嘛寺的监管和对佛教教规的整顿也成了川边政府的应行之事。鉴于此，1933年退守川边一隅的刘文辉在继承上述政策的前提下明确地提出了“以政翼教，以教辅政”的方针。⁵ 由于喇嘛人数在康区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许多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寺庙，凡康民之精神物质生活，均在宗教范畴之内，故康地寺庙的盛衰消长，与地方政治及人心趋向均息息相关，康区社会的寺庙组织绝非任何主观力量所能摧毁。因此，刘文辉对康区佛教“既不恃武力，亦不假权术，惟知开诚布公，因势利导，力谋政教之协调合作，以纳民于轨范”。在此认识的基础上，1938年5月14日，刘文辉于释迦成道日在康定成立五明学院，通过五明学院来整理、规范康区佛教，同时，召集僧伽代表会议，宣布治康政见，以减少施政障碍，并间接地由研究学术之机关沟通汉藏文化，协调康地政教，以收团结人心、巩固边防之效。⁶ 上述这些措施正是刘文辉所提出的“以教辅政，以政翼教”方针的具体实践。

同时，刘文辉也十分注重通过自己的活动加强对康藏佛教人士的笼络。他在自己住宅布置一座经堂，迎请阿旺堪布、格聪活佛、日枯古学等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自己也随时拿着手摇转经筒，口念六字真言不绝。⁷ 他还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以经济上的照顾。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西藏的一些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三大寺供养，并派人到拉萨学佛，借以加强政治联系。

¹ 参见黄奋生：《蒙藏新志》，《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5册，第245页。

² 参见贺觉非著、林超校：《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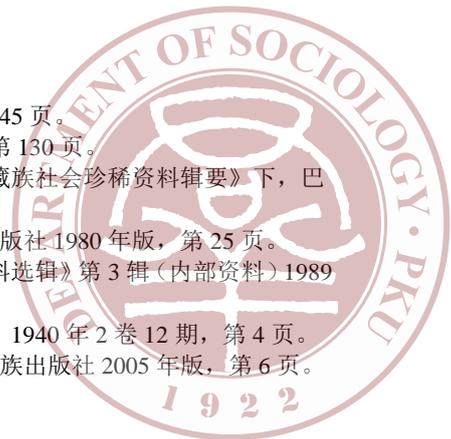
³ 刘文辉：《第二讲建设新西康的理论体系》，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85页。

⁴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⁵ 参见离谦：《康定县藏传佛教概况及其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24页。

⁶ 参见刘文辉：《对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的希望及本人治康简单经过》，《康导月刊》1940年2卷12期，第4页。

⁷ 参见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¹ 就这样，曾被刘湘等军阀联手打得一败涂地，只剩下川边关外十几县、政治生命垂危的刘文辉，“玩出一套‘弘扬佛法’的花招，便能稳住阵脚，慢慢又爬起来”，最终也使得“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²

除了以尊重宗教为核心外，刘文辉从中国几千年来经边政策的得失中，结合他十余年来治边的经验，把“建省”、“经边”、“对藏”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分别确立了“四力”、“三化”以及“三进”政策。刘文辉认为，“在经边的意义上，也可说，西康建省的动机，完全是针对西藏问题，至少应将西藏问题包括在内”。³ 并在深刻体会到对藏问题的困难症结后，刘文辉对康区的吏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也做了详细布置。在吏治方面，彻底澄清吏治，加强民族联系，努力将西康政治影响扩大到金沙江西岸，使藏人产生向心力；经济上，把边茶作为经边、对藏的政治工具，牢牢控制边茶的经营贸易；军事上，在金沙江东岸，配备相当武力，采取震慑的态度，以防止藏军东进。⁴

总而言之，刘文辉在西康所采取的上述这一系列政、教措施在客观上大大缓和了西康汉藏民族间的矛盾，改善了康藏关系，对西藏方面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康、藏双方在康区政治争斗的结果是，“康人无不乐受汉官管理，而西藏以此失其引诱煽惑之魔力”。⁵ 由此刘文辉也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并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此外，客观时势的发展变化也给刘文辉在康区地位的稳定带来了契机。

首先，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迫使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对班禅回藏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通过西康建省来实现解决西藏问题的迫切性。同时，由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在国民政府西移后，西康在经济资源、汉藏桥梁等方面凸现出了它的价值，川康地区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出于加强西南地区国防安全的考虑，西康建省实难再缓。其次，就当时的康藏关系来讲，自1938年春天起，西康、青海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一连串和谈会议的召开，有效地巩固了康青藏边区局势，为西康省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了西康建省委员会，并指定刘文辉为委员长。4月，刘文辉赴汉口会见蒋介石，力陈西康建省的必要，蒋除了表示答应将宁、雅两属划出四川以实西康外，还应允在西康建省后，按省预算由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补助西康不足的行政和建设经费。⁶ 11月20日，行政院在武汉召开国务会议，经讨论后决定西康建省，并于11月28日致电刘文辉，定于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立西康省。

随着西康省的建立，从清朝瓦解以来一直处于失序状态的康区被重新纳入一个新的统治秩序之中，在制度上有效地保障了康藏边界地区的稳定，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于加强康、藏之间的民族感情、经济交往以及康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对于刘文辉来说，西康省制的确立也最终为他在民族、宗教相当复杂的康区赢得了“合法”的地位与生存空间。

四、结语

通过对1927-1939年西康省制化过程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从西康民众对建省的态度来看，康民要求西康建省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社会动荡、安全缺乏的环境下为了免遭外界军事、政治等势力的蹂躏和迫害，并要求保护地方利益的

¹ 参见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5-26页。

² 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6页。

³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之理论与实际》，《康导月刊》1944年5卷10期。

⁴ 同上。

⁵ 刘文辉：《第六讲：建设新西康的六项任务》，《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第777页。

⁶ 马宣伟：《刘文辉与西康建省》，《文史杂志》2002年第5期；刘文辉：《第一讲：建设新西康的基本认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第520-521页。



省籍意识的觉醒。这种省籍意识是针对西康军政当局及西藏地方政府贻害康区而表现出来的脱离二者、要求自治的心声。此外，西康民众还积极要求国民政府直接指导西康建省，这反映了康民对改良康区政治的一种期待，同时也为国民政府加强对康区的控制带来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实力相当有限，西康民众在省制问题上的希求并没有结果。

其二，在1932年进行的建省实践中，拥有双重身份的格桑泽仁为了建立一种在西康地方精英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社会，并将其理念付诸实施，以清除外来军阀在康区的统治权威。在此过程中，康区精英的身份使他必须尽量地为康民赢取更大的自治空间。然而，作为中央政府在康区的代言人，格桑泽仁的省制实践又不能游离于国民政府的康藏边政框架之外。从学理上看，国民政府倡导康人自治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地方对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效忠与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国民政府基于和刘文辉在康区势力的权衡以及对西南边疆局势整体的考量，并没有对康区精英所发动的以“康人治康”为核心的西康省制实践给予足够的支持。

其三，国民政府试图直接介入康区事务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与时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生了控制权上的争夺。在实际主康的刘文辉看来，国民政府发动康区精英实行自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除由地方军阀主宰西康的局面。这种情况迫使刘文辉采取正确的治康措施来改善康区的政治环境以收拾人心，从而有效地抵制了国民政府所支持的一系列反刘事件，也在客观上改善了康藏关系并最终牢牢地在康区站稳了脚跟。同时也应该看到，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刘文辉之间的这种权力纠缠只是一种统一国家建构层面下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反映，这种权力之争会随着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时势变迁而转变。总之，西康省制化进程既是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力量权衡下的一种讨价还价，也是双方在战略上的共赢。

在国民政府与刘文辉就西康建省达成一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泯了康区本土民众对其理想中省制权利的争取。这一点在1945年7月格桑泽仁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时所提交的《请确立蒙藏自治区制度载诸宪法草案》的提案中有充分体现。在该提案中，格桑泽仁指出了整齐划一的省县制度严重脱离了康区的实际政治情况，并建议取消形式上的省县制度来提高康民的自治程度，进而达到改良康藏政治以加强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目的。¹ 格桑泽仁的上述主张充分反映了西康的省县制度与康区民众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制度存在着一定差距，然而这一提法在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康区的实际情况下，无疑又过于理想主义。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99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参见格桑泽仁：《边人刍言》，1946年铅印本，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目录（司法行政类）全宗5-102/4，第60-63页。

